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5.002

毛泽东研究中的虚无社会主义 革命及其理论批判^①

王晓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虚无言论的真实目的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歪曲、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功绩和地位。历史虚无主义虽以学术的面孔出场,但实质性地涉及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因此,为了揭示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荒谬,我们有必要回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情境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回应和批判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012-07

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歪曲、否定,在理论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错误观点频现,其真实目的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历史虚无主义虽以学术的面孔出场,绝非是单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否定,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性或学术性问题,它在本质上蕴含着特定的政治诉求,其寄希望通过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否定,抽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历史性根基,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合理性^①。为了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和错误,我们有必要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情境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进行回应和批判。

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社会主义革命使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顺利地实现了社会变革,推进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具历史性的

伟大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并不认同这一既定论断,总是通过一些史料“残片”建构出令人难以信服、甚至不合理的观点来否认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巨大历史贡献。若不对这些荒谬的论断加以剖析,任由其肆意蔓延直至泛滥成灾,那么不仅难以从学术层面上深入毛泽东研究,还会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构成重大的阻碍。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散布在各种论文、专著和回忆性文章中,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广大民众的视野。这些论断一出场就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对缺乏历史常识与判断能力的大众构成一种巨大的信息冲击,给当今社会主义的建设、改革、发展及稳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论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论分析模式和历史叙事模式。即“以今反古”论、“革命早熟”论、“告别革命”论。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其意在通过否定社会主义革命来达到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非替代性历史贡献的目的^②。

^① 收稿日期:2019-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DJ042)

作者简介:王晓峰(1982—),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② 尚庆飞:《新时代背景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东岳论丛》2019年第3期。

^③ 张明:《新时代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理论维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一)“以今反古”论

脱离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以当前的时代要求和历史条件去评判历史,是“以今反古”论的特征。比如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提出并希望在15年之内完成的“三大改造”,只是主观动机良好和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激进式热爱,在当时并不具备客观条件。这种观点还指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几十年探索,其实是走了弯路、绕了一个大圈,付出了极为惨痛代价之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探索道路上建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模式,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复归,而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的制度框架与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历史虚无主义还断章取义地援引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争论,认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符合邓子恢当时所作出的判断和意见,刻意强调在农业改造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失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理论,似是而非地加以论证指出:当某种生产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即还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阻碍力量之时,对其超前加以改造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应该的,因为这种强行改造无论是对生产的发展还是对综合国力的提升,抑或是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极其不利的。然而,生产方式何时能够将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释放出来,它又何时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问题——何时应该改造生产方式的问题,只有能够拿出当时的生产方式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证据,才能证明对生产方式加以改造的非科学性。否则,纯粹的理论分析与论证只会抛出一堆不切合实际的话语。

研究历史是为了推进当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历史资源中挖掘出活性要素以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无疑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旨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按照今天的现实去“反推”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已成为过去就不应当将其强行拖入当下,全然以当下的视角和眼光去看待历史而忽略历史事件发生的某种客观必然性,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分析与解读必定是不合理的,得出的结论也必定是荒谬的。

(二)“革命早熟”论

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从步骤与形式层面所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但也恰恰是这种形式上的成功掩盖了指导中国历史向前推进的思想出现了非科学性要素,进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早产儿,它还是一个畸形儿。”^①在历史虚无主义看来,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后,放弃了所精心构筑的新民主主义论,而是建构了一个具有超现实性的“乌托邦”,通过捷径步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左”的错误指导以及实践失误。这种观点的直接论据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和破坏性,而间接论据则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设想和权力运用上的“独断专行”,由此在逻辑上跳跃式地“否定”了党和人民历经改造和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巨大历史贡献。

“革命早熟”论历史虚无主义者指责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说其“搞早了搞错了”,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破坏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科学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效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认为1978年以前大约30年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艰辛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轨迹“是一部荒唐史”。还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超前的革命运动,中国应像西方国家那样先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拿西方的社会发展历史与理论强行套用在中国历史进程之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处环境之特殊性视而不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②“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③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和发展,也是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所应秉持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

(三)“革命错误”论

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空前的低潮,一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

^①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③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主义运动的声音开始沉渣泛起。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将自由资本主义树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国内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与之遥相呼应,成为“历史终结论”的忠实拥趸。

“革命错误”论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一切革命运动进行“批判”,认为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都是情绪化活动,使整个社会大范围地出现“群体无意识”状态。革命运动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解构力量。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还片面地强调革命的沉重代价,认为革命使得饱受剥削与奴役的中华民族精疲力尽,使整个民族仅有的社会重建能量都耗尽于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华民族在本身就已疲惫不堪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彻底失去了向前迈步的力量与勇气。

“革命错误”论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国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胡适和李大钊关于“主义”和“问题”的辩论,当时就不应该依靠李大钊所倡导的所谓的“根本解决”办法,而应该按照胡适所提倡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来实施和推进,便“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抹杀革命功绩的结论:必须彻底“告别革命”,亦既要彻底告别来自“左”的力量而引发的革命行动,同时也要全然拒斥来自“右”的力量所诱导出的革命运动。“告别革命”论尽管没有将否定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也是在他们否定的范畴之内。

(四)反思与透视:诸种虚无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特征与实质

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根本上可以说二人的争论只属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完全没有上升到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高度。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只能用以佐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法与方式问题,用其直接作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际上,1956年的中共八大报告对这一发展情况作了详细的报告,其中以工业为例,根据报告显示的数据即可得

知,工业总产值在五年之内的增长速度是极其惊人的——增长了90.3%。工业总产值已经超出预期地达到了原计划在1957年完成的指标,甚至有诸多项目在1956年的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在1957年实现的重大指标^①。

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与虚无都是采用强行嫁接、以偏概全的方式。要么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在细节问题的讨论“上升”为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争论,要么刻意强调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实施的革命运动之巨大破坏性,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成果全然无视。其实质都是意在否定革命本身,进而否定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就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了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初步探索走向社会主义无比伟大的非替代性实践,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凭借过人的理论运用能力,对时代主题与历史核心任务的深刻把握,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审时度势、缜密的思索与科学严谨的考量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它的巨大创造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客观必然性亦是毋庸置疑的。

二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单纯的政治革命运动,而需要刨根问底地去追问其本真历史意蕴。社会主义革命既是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革命和社会变革^②。这一系列运动并不是也不可能由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而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社会发展规律在背后加以强力支撑。因此,必须积极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客观必然性维度加以分析并确证。

(一)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基于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详尽的考察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刻地解了人类思想史上争论了几千年而未找出答案的重大难题。

马克思曾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

^①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7页。

^②张建忠:《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逻辑及其历史演进》,《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①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而言是基础性的内在支撑力量,而在这一巨大的内在力量支撑之下所建构的各类关系则是生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就一定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在特定的背景下,生产关系的前瞻性会得以彰显,表现出一种超前性与不适应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这种超前性会被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赶超。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而非单向的推动与被推动关系。简言之,伴随着生产关系的“稳定——变迁——新的稳定”的变化过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处在“适应——不适应——重新适应”的循环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通过努力调试与变革使自身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诉求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用于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把关键性钥匙,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必然性。”^②当生产关系从根本上不适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之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便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质的变革与调整,使生产力发展的诉求得以满足进而步入一种全新的平衡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当时的生产关系的滞后性,因为没有这种滞后性与不适应性,革命实践背后就没有客观必然性和足够的动力加以支撑,革命运动的胜利亦是难以预测的。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超前的和不必要的。他们忽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在新生的中国政府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此时的中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的境况有着质的差异性,社会经济的重建与发展为其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强烈诉求。所以说社会主义革命也同样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

(二) 社会演进形态的多样性: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社会形态发展与更替的一般规律规定了人类

社会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因为社会形态发展与更替的历程不是一个简单累加或替换的过程,而是一个一般演进规律与人类历史选择——人的主动选择与主体性彰显相结合的过程。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尚未得以充分发展的国度也具有社会主义出场的可能性,甚至一点也不亚于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国家。

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性问题,列宁则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给予答案:“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革命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生动的实践证明了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尚未得以充分发展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先政治后经济”的特殊性显著的发展策略与模式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有之意,这已经是被活生生的革命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④。这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与胜利的催化作用是显著的。

受俄国革命的积极影响,中国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从新中国的现实处境维度加以审视亦不难发现,种种迹象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在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未实现充分发展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其艰难与曲折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即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及封建阶级不愿意放弃其利益获得机会,千方百计想阻挠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发展具有滞后性的国家先于经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无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答案。因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其阻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但是,无论这一旅程是如何的艰辛,历史都已雄辩地证明了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是可行的。

(三)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消灭剥削和社会分化

无论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出场之前的奴隶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

^④竭长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与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会、封建社会,还是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无比惊人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例外都存在着两种或多种阶级的对立与冲突,都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其理论旨趣所在,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之一。将存在着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形态加以淘汰,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的所在。简言之,“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就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并引导社会走向共产主义”^②。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端之后步入科学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存在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差异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有了得以确立的前提,人们在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才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机制。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苦苦追寻的平等与自由。可以说,如何在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地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现象,就成了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站起来,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与格局都构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冲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与壮大更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必须注意的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傲然耸立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国度已彻底消灭了剥削与压迫。实际上,新中国的诞生仅仅是构成消灭剥削与社会严重分化现象的政治前提。因此,后来所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四)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共产主义的终极归宿

苏联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重大挫折,而资本主义则出现了经历过战争洗礼后的繁荣景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就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将一直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始终,因此资本剥削和两极分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必定会始终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会不可避免地

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症结,决定了它注定会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被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③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的缓慢而平稳的发展过程,而是需要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对旧社会形态的消极因素加以有力清除,新社会制度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建构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 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具体预设和解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问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它的理论预设与科学前瞻中深藏着某种能够启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因素。但凡如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关乎中华民族生存与命运乃至关涉整个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仅有理论层面的必然性阐发与论证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具体的实践加以佐证。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论证而言,除了将其放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从理论层面上加以系统阐述,我们还必须将其放置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全面考察,以科学寻找深藏于具体革命行动背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讲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但是,工业化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头戏可以说是“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的提供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论证必须首先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着手。

(一)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与启示: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

工业革命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全球扩张,导致中国逐渐从万国敬仰的天朝上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贫国弱国。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强烈冲击发生在1840年之后的几次大规模的中外战争中,屡遭惨败的清政府不但毫无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页。

②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省与自救的意识,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将主权和领土拱手割让与侵略势力,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中华民族由此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但清政府仍未认识到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未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加以详细阐发。但他们在多处文本中都提及了工业化的积极作用,指出扬弃资本主义剥削的维度之后的工业化对劳动者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非替代性重要意义^①。反观近现代西方的发展,无论是欧洲诸国的崛起,还是美国越居世界强国之列,都得益于工业化的巨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及工业化的成果不仅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积极利用,也为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心的苏联在二战期间成功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多次有预谋的猛烈进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正是在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之下苏联成为二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所以,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重要维度出发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业化,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可以说,直到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工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所以,在全新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中积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一饱含着近代中国屈辱历史并寄托了无限强国与复兴之重大责任的历史任务,就无可推卸地落到了刚刚取得国家政权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身上了。

(二)中国近代史发展轨迹的重大教训: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行不通

1949年刘少奇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②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诸多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历程中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因此,尽管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是毫无希望可言的,但是一味地追求工业化而不注重工业化所隐藏的弊端与单一的工业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危险的。

纵观世界诸国的工业化道路的实现历程,大致总结为两条道路。一条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另一条则

是苏联所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特殊性的路径,以突破起步晚、底子薄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发展瓶颈。我们知道,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倾注大量精力想要建构的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工业化道路加以否定之否定之后方能建构的一种特色现代性和工业化道路,亦即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③。十月革命爆发前,俄国在整个欧洲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由于步入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在短短数十年便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强大的“两极”之一。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无疑有着重大的启发,对中国最终所作出的抉择也是有说服力的^④。这种说服力不仅仅源自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是两者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境况有着诸多相似性。

就中国领导人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而言,比苏联历史所给予的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工业化实践尝试的失败经验所给予的惨痛教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发展成为先进的、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工业化国家。所以,帝国主义不会放任中国走上他们自己已铺平的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甚至不愿意看到中国以任何一种形式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其次,生长于西方侵略势力与封建主义夹缝之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萌芽之日起,其发展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两股力量的依赖性导致了其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导致了它的软弱性,因为它自身的发展自始至终主要依靠外在的两股力量的支撑,因而对这两股力量的反抗就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性。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只能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这两股力量博弈、较量或合作所构成的某种“缝隙”间加以生存。所以,民族资本主义所试图要走的工业化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

^①李仁卿,廖义军:《略论建国初期党的工业化思想》,《湖湘论坛》2010年第3期。

^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③罗建华:《毛泽东求解现代性问题的深层逻辑探析——基于对阿里夫·德里克研究成果的解读与反思》,《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④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三)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诞生后,面对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所必须走的工业化道路,唯一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意味着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及其相应的成果加以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第一次由理论形态转向现实形态。这种转变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规定动作”,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都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之上^①。

对已有的工业发展成果加以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抉择的必然性与科学性既来自对苏联模式的参照、学习与借鉴,更来自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中的教训所给予的深刻启迪。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朝鲜战争及其各种效应所致的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多维度封锁,使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并走出适合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更显其迫切性^②。这意味着,尽管我们无法按照此前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加以推进,但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又必须具有某些有别于苏联的要素。当然,这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的,而是在后来长期的学习、模仿和创造性实践过程中加以凝练而成的。

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得不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对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实质性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需要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那种过于分散经营的、完全依赖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注定难以为大规模工业化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原材料。所以,必须改造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通过合作化道路消除“碎片化”生产固有的弊端,以农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将小农经济科学合理地实现转型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的道理,带有私有制属性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必须通过改造实现更大的联合。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前提之下方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生产优势。也只有如此,三者方能为工业化进程铺平道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概言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唯一的选择便是对工业加以社会主义改造。

Nihilistic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Criticism in Mao Zedong's Studies

WANG Xi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eal purpose of the nihilistic statement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b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is to deny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thus further distorting and denying Mao Zedong, hi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status, and Mao Zedong Thought. Although historical nihilism appears in the academic face, it involves the conten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substantially.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absurdity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to see 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to respond to and criticize the historical nihilism arguments ab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theoretical criticism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张明:《重构中国现代性的三重意识——基于毛泽东的探索性实践及其当代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

②武力:《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演进》,《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